

建国前中共党人对孙中山的纪念

潘大礼,黄兆^①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 建国前中共党人对孙中山的纪念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差别。随着时局变迁,在孙中山去世、国民革命失败以及抗日战争前后等阶段,中共党人纪念孙中山的内容和意义虽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利用不同的纪念空间,通过集体记忆的形式,一直重申自身革命的正统性并付诸于实践,从未改变过。

[关键词] 革命; 建国前; 中共党人; 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 D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3-0072-06

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其忌日与“双十节”等纪念日一样,成为一种国家层次的政治符号,具有全民动员性的纪念活动。有学者指出:“纪念是打造和形成某种话语的空间场域,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影响力。”^[1]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已有很多,然而,以“集体记忆”为视角,考察中共党人对孙中山去世后的“回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集体记忆是指:“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2]43}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本文以纪念活动为中心,试图分析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共党人对孙中山的纪念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以借此重申其不断革命的诉求。

一 坚信革命:对孙中山去世的纪念

纪念须通过一定的空间来展现,而空间则有助于记忆的产生。在空间场域里充满着各种关系,类似于一个网络结构。单就表达人物崇拜、敬仰与怀念行为的纪念活动来说,纪念空间“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而纪念空间的功能又是“创造历史(英雄和历史事件)的永恒价值,这需要通过物质性的营造和空间策略的运用来建构。”^[3]因此,建国前中共党人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是利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等空间形式展现,表达对孙中

山的记忆与怀念。同时,纪念空间的内容是历史,目的是唤起人们的记忆,中共党人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唤起民众对孙中山本人的回忆,而且还有利于扩大中共作为孙中山革命继承者的社会影响力,增强革命话语权,进而领导革命成功。

(一) 赞美孙中山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孙中山去世当日,李大钊即发文称赞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居于重要的位置,他指出:“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4]97}李大钊在孙中山的追悼会上,送了一副挽联,高度评价了“孙中山40年瘁心于民族革命事业的精神和伟大功勋,对孙中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号召人们遵依孙中山的遗训,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以告慰英灵。”^{[5]297}时隔一年,1926年3月17日,李大钊在清华学校追悼孙中山的会上发表讲演,再次肯定了孙中山的革命功绩,指出:“今日追悼孙先生,吾人即想到他在国民革命史上之地位。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被外国力量所侵略,为外人经济(掠夺)的时代。孙中山先生相信三民主义,以抵抗一切帝国主义者,则是一方面结束以前的历史,一方面开新的道路,其为功实甚伟大。”^{[4]103}李大钊称赞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民族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向社会民众重塑了孙中山高尚的革命事迹与革命精神,激发了民众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追忆,并继续革命。

陈独秀也表达了对孙中山不幸去世的痛心哀

悼。1925年3月14日,陈独秀作了一篇悼文,认为中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全国民众十分悲痛,其写道:“全中国的民众呵!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因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6]854}在此,陈独秀试图通过突出孙中山去世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极大损失,以及反动势力趁此向民众加紧进攻,向民众传达继续革命的重要性。

在瞿秋白看来,孙中山生活60年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是民族革命的中国,而孙中山的历史使命,便是完成这一民族革命任务。瞿秋白高度评价孙中山是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最早领袖:“他集合数万被压迫剥削的民众在这力争民族解放和平民政权的旗帜之下。”^{[7]130}此外,孙中山的伟大也在于,他能随着社会革命势力的增长,进而提出不妥协的革命纲领。

中共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撰文表示,在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广大青年要了解孙中山的思想和志愿,要格外珍惜他的经验和教训。恽代英还呼吁广大革命青年即刻加入国民党,去参加民族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他他们的工具。恽代英指出:“孙中山先生代表全民族而奋斗的精神,是永远不磨灭的。”^{[8]652}恽代英希望革命青年继续奋斗,以更好地纪念孙中山,使他的事业在短期间内能够成功。

对于选择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李大钊认为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实,促使孙中山自觉肩负起民族革命的重任。孙中山以毕生精力和革命信念,使越来越多的革命志士加入到民族革命的道路上来。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征程,直到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李大钊认为:“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9]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李大钊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时代背景对个人的影响,分析了孙中山不断开拓民族革命事业的过程。瞿秋白也持相同的看法,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六十年中一步步的进化,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家——孙中山也就在这过程里逐渐的生长出来。”^[10]中国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影响之下,已走上了正当的道路即反抗一切反动势力,须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

义势力、被压迫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和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

(二)孙中山与列宁的比较

十月革命对中国影响极深,孙中山去世后,中共党人常将其与列宁作比较,认为列宁之于俄国革命犹如孙中山之于中国革命。李大钊认为孙中山是亚洲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经唤起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必能由中国民众革命的努力经由中山主义的道路——证实。”^{[4]152}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更加相信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

李大钊同样认为,列宁去世是俄国革命的损失,孙中山去世也同样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李大钊十分欣赏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可与列宁相媲美,他指出:“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4]93}孙中山的精神就如同列宁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每个人都应该服膺这种精神。李大钊指出了二人的革命精神具有相同点,即遇到挫折和失败时不灰心、不失望。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中山主义也是如此,在理论和策略上,二者可以联合成一体。李大钊指出:“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4]94}在李大钊看来,孙中山与列宁在思想与人格上的伟大方面,没有不同,并大声疾呼不管是列宁主义者,还是中山主义信徒,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

张闻天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即撰文将孙中山与列宁作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孙中山与列宁具有相同点:代表被压迫阶级进行革命。然而孙中山与列宁仍有不同点:列宁死后,他所遗留下来的是代表“一般民众”一天天强固的苏维埃政府。而孙中山死后,他所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国国民党,并且这个党又因为内部的不同派系快要分裂了。为什么列宁是成功的,而孙中山是失败的?张闻天指出:“孙中山的失败是由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分子的复杂,那个国民党中间有资本家,有政客,有军人,有中产阶级,有共产党,而他们的结合并不由于共同的信仰!”^{[11]115}反过来看,列宁在许多方面却完全和孙中山不同。列宁领导的共产党是农民、工人与兵士的利益联盟,他们都有一致的信仰。列宁不论做什么事,他的后面总站着他所成功领导

的共产党。

虽然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行将涣散,但他的理想却留了下来,即外抗帝国主义的侵掠,内而消灭封建的军阀制度,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新国家。如何实现孙中山的理想,依靠分裂的国民党和召开几个追悼会是不能够成功的。张闻天认为:“这需要一个代表全民众的利益的结实的新团体!只有在这个拥护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新团体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才有实现的可能,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才是不巧的,孙中山先生才是不死的,他在九泉之下才可以得到安慰!”^{[11]116}显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此重任。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与李大钊等党内领导人不同,张闻天能够较为客观深刻地批评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并指出其分裂与失败的必然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孙中山去世后,中共党人对孙中山在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这种崇高的历史地位与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并且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与列宁相媲美,称赞孙中山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性的革命领袖。中共党人通过各种形式的纪念途径,回溯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唤起人们的记忆,并确定未来革命的发展方向,明白地指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是世界革命事业的重要部分,号召国民与国共两党继续革命以完成孙中山的遗愿。

二 继续革命:对孙中山去世后时局的预测

孙中山在晚年与共产党合作,对国民党进行改造,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彻底消灭国内的一切反动势力。孙中山去世后,反动势力一定会有所行动,中共党人在相关纪念中,表达了这种担心。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这是全世界人民公认的。孙中山去世不久,瞿秋白即发表纪念文章,指出孙中山“生存的几十年,全世界的反动者、压迫者、剥削者,以及一切国贼、民贼,时时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如今孙中山死了,这些人好容易舒了一口气。”^{[7]137}孙中山病逝后,这些反动势力理所当然地以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会容易镇压下去,都幸灾乐祸的高歌起来。带有反动色彩的《时事新报》发文污蔑辱骂孙中山,瞿秋白回应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先生虽死,中国平民这种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中国平民中觉悟的分子,在中山死后,必定格外团结,集中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努力奋斗以推翻国外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政策。消灭国内的军阀以及一切卖国卖民的

民贼。”^{[7]139}孙中山早期反抗清政府,民国时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做斗争,晚年则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瞿秋白乐观地认为,孙中山去世并不会导致革命形势的衰落,相反革命会继续下去,他指出:“中山虽然死,中国还有四万万的中山,中国平民仍旧要继续国民革命的斗争,决不因中山奋斗未成而失望。”^{[7]139}孙中山去世使得各方反动势力欣喜若狂,由此可见,孙中山所走的民族革命道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是一条不断遭到反动势力抵制和破坏的道路,离民族革命事业的成功还有一定的距离。

蔡和森也持相同看法,他认为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的发展是由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形决定的,中国的革命运动非孙中山一人所能左右,是帝国主义入侵逼出来的,从而指出:“孙中山虽然成就一些自己的理想和主义来号召并指导中国的革命,但他那些理想和主义都是客观情形的反映。”^{[12]720}在蔡和森看来,孙中山去世在革命的主观条件上,诚然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但是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会因之而消减,更不会因之而死亡。如果革命的客观情形不再存在,换言之即外国帝国主义不再侵掠,中国军阀不再祸国殃民。那么,就是孙中山不死,中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完全停止。正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依然进行,国民革命运动也便继续存在下去。蔡和森进一步详细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生死不是由孙中山个人的生死来决定的,乃是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生死来决定的,抽象的说便是由客观情形来决定的。只有打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才会终止。”^{[12]720}正如孙中山的遗嘱说的那样,要唤起民众,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即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相联合,因为两者的敌人是共同的。

陈独秀同样认为,孙中山逝世对国民革命的发展影响不大,通过分析帝国主义、安福系军阀、研究系军阀等三种反动政治势力对孙中山去世后的言论和态度后,认为反动势力幸灾乐祸为时尚早。革命的领袖孙中山虽然死了,革命的党是不会死的,陈独秀指出:“我们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更有力量。我们警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且勿因中山先生之死而存幸灾乐祸的心理!”^{[6]854}只要反动势力不能斩尽杀绝中国的革命党,四万万人中只要有一人继续孙中山之志而奋斗,孙中山都未曾死去。

恽代英也指出,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导师,他的逝世对于中国革命势力有极大的损失,不但中

国,就是全世界也受极大影响。然而,却没有人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是不对的,没有人说中国的内乱是孙中山从事革命导致的,每个人都承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将中国人引向好的地方。然而恽代英却认为,孙中山活着与去世时对革命的影响是不同的,他说:“当他生存时,他攻击国际帝国主义,于世界革命有裨益,全世界弱小民族都蒙其利,所以他死了,世界革命也将受帝国主义者更重的压迫。”^{[8]646}孙中山去世后,革命的危险加重,反动势力一直想破坏中国的民族革命,恽代英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加入国民党,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孙中山虽然不幸去世,但中共党人对民族革命的发展仍抱有极大的希望,通过纪念的形式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鼓励继续革命。

三 批判反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对孙中山的纪念

纪念有助于社会记忆的重塑,但是记忆主体并非被动的受塑方,有学者指出:“在记忆的塑造过程中,纪念空间能否对记忆发挥建造者预设的功能是不言自明的。”^[3]大革命失败前后,国民党篡改并逐步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消极革命,积极反共。中共党人在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中,已明确表达对国民党反革命行径的反对和不满,试图力争国共合作继续北伐。然而,这些纪念活动未能达到中共预设的效果,国民党最终仍背叛革命,投靠了国内外的反动势力。

1927年3月,陈独秀在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之际,针对国民党当局取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背叛革命之际,撰文表达了悲愤之情,他说:“中山先生逝世才两年,便有人暗中取消他的政策或更明白的说他的政策不能用,这怎不令人悲愤?!”^{[6]1222}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军事发展及胜利的最大原因,是基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例如黄埔军校的产生,苏俄的援助是关键因素。反动势力知道国民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民革命进程以自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同中共决裂,在陈独秀看来这是向黑暗势力投降,指责蒋介石“还算什么革命领袖,还算什么中山先生的信徒!”^{[6]1221}

不过,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仍抱有一丝幻想,期望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是终于要循着进化的历史向前发展的,全国民众革命的高潮,也必不会因少数人妥协软化而中止而低落的,少数人妥协软化,只是他们自己随着黄兴派、政学会、联治派、西

山会议派的覆辙而落伍,真正革命分子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历史更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6]1223}陈独秀大声呼吁,凡是革命分子,都应该坚决的继续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遗嘱与遗言,撇开一切妥协软化分子而勇猛前进。必须是这样,才有脸来纪念中山先生,才是真正的纪念中山先生,否则中山先生也未必愿意人们假意纪念他。

1927年11月,恽代英发表纪念孙中山的文章,批判了国民党的反革命行径。恽代英一方面肯定了孙中山一生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孙中山的某些理论和策略有不当之处,即片面追求军事运动而忽视联合农工等阶级势力,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合作进行革命的失败。虽然孙中山具有勇敢进取的精神,能够跟随历史潮流,吸收最进步的思想指导革命,但是孙中山在去世前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却不够彻底。在恽代英看来,孙中山既吸收了苏俄的新思潮,在他的三民主义里也保留了不少的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旧思想。这些旧思想遂成为戴季陶、汪精卫等人反共的理论基础。因此,恽代英指出:“我们爱孙先生,尤其爱工农兵群众的利益与自由,所以,虽然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三民主义中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理论,是要攻击的;对于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偶像以厉行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要打倒的。”^{[8]1008-1009}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篡改孙中山的主义和政策,实施反革命政变,遭到了中共党人的批判。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共党人通过纪念孙中山,阐释正确的革命精神,使国民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过,中共党人对孙中山革命记忆的重塑,并没有阻止大革命的失败。

四 共同革命:抗日战争中对孙中山的纪念

纪念日如同节日一样,是人类社会逐步形成的对人物或事件进行记忆的时间符号,其在国家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功能,甚至成为国家传输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在人类历史上,纪念日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与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在民国众多纪念日里,以孙中山纪念日为最多,这是国民党为强化意识形态而有意为之,目的是“通过表述特定的观念而达至普通民众对象征符号的接受,从而营造权力格局和国家认同。”^[13]民众受此纪念日的频繁实践,以致形成了条件反射心理状态,纪念日及其背后的内涵深深地印入民众脑海,由此可见孙中山纪念日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十分巨大。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说社会思想本质上是一种

记忆,“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2]312}孙中山纪念日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全国性的有关孙中山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中共党人纪念孙中山、宣传革命精神及进行国民革命,扩大革命话语权的重要场合。抗日战争时期,“每逢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和诞辰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都会组织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表现得相当隆重,它体现了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一种情怀,以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敬重。”^{[5]314-315}该时期中共党人对孙中山的纪念意义,也随之发生了与以往任何时期不同的变化。

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大会,毛泽东曾亲自撰拟了三幅纪念孙中山的挽联,其中一幅是:“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5]315}这幅挽联内容形象生动,用问答的方式,形象地表达了孙中山进行两党合作的正确政策。当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又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革命功绩,他说:“孙中山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但如此,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14]111}毛泽东还专门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统一战线政策作了赞扬,他指出:“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14]112-113}此外,毛泽东指出了纪念孙中山要特别注意三民主义、统一战线和艰苦奋斗,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宝贵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14]112-113}从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发表纪念孙中山的演讲来看,不仅继续称赞三民主义,而且还增加了统一战线、艰苦奋斗的内涵,说明中共党人期望借此增强与国民党以及爱国人士的合作,为抗战胜利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同日,周恩来也发表文章纪念孙中山,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在于他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

是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我们全中国的同胞要学习孙先生的伟大并实行孙先生的伟大遗志,争取抗战胜利,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5]董必武则回忆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第一次谒见孙中山的经过。孙中山对董必武等人给予鼓励,认为“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16]38-39}接着董必武又说:“现在我国正在进行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我们因为军事政治经济上有严重的缺点和弱点,在抗战过程中,自然容易遭受暂时的部分的挫折,有些意志薄弱的人,难免不因此受‘敌人的威吓和软化’。”^{[16]38-39}董必武希望通过这个事例,借用孙中山的革命训言,增强国人抗战的意志,贯彻到底争取胜利。

在抗战晚期,政治环境逐渐明朗,中共党人在纪念孙中山时,内容再次发生了改变,例如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作了名为“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的演说,引用孙中山的话说:“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17]这段话表明,抗战胜利后如何处理两党关系并重建民国成为当务之急。中共党人呼吁国民政府战后施行宪政,并从民主中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建设“真民国”。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通过孙中山纪念日的空间场域,展现了作为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继承者,希望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爱国力量进行联合抗日的愿望。而此时国民党也全面阐释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纪念日成为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构建宣传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复兴的符号,再次成为两党合作进行革命的政治基础。

五 结语

纪念空间具有生成社会记忆的功能,而社会记忆又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来源。中共党人通过各类纪念空间,唤起民众对孙中山的社会记忆,宣传革命精神,进行国民革命。在美国学者安德森看来,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18]。这种建构依托于纪念空间所生成的社会记忆。基于此,作为社会记忆的“孙中山”,则成为了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共享的革命符号。

集体记忆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进行记忆。因此,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个的中共党人,来分析中共纪念孙中山的“集体记忆”。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社会阶级、家庭、协会等等都拥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通常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2]40}因此,中共党人通过纪念孙中山,才能找到国共两党之间的共同记忆,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中共党人纪念孙中山,除了对其本人的深切怀念外,也是大力宣传革命精神,促进国民革命发展的重要契机。随着时局的变迁,建国前中共党人纪念孙中山的内容和意义虽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利用不同的纪念空间,通过集体记忆的形式,一直重申自身革命的正统性并付诸实践,并未改变过。这也成为中共后来建立新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 刘伟,潘大礼.革命纪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纪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2):58-64.

[2] [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学术月刊,2012(7):134-137.

[4]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6.

[5] 罗福惠,朱英.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8]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29.

[10]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4.

[11]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2]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 陈蕴茜.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5):76-90.

[14]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周恩来.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N].新华日报,1938-03-12.

[16] 董必武.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6.

[18] [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1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emory of Sun Zhongsha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PAN Da-li, HUANG Zhao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Abstrac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 the memorial connotation of Sun Zhongsha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had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such as the periods of when Sun died, whe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failed,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tc. In those periods, the contents and meanings of the memorial connotation of Sun had always changed. Bu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has never changed, that is, they commemorate Sun collectivel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or different places, they reiter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revolution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Key words: revolution; before foun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un Zhongshan